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5.03.022

代际合作育儿:转型期农民家庭 育儿模式的调适与反思

李永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抚育是家庭的重要功能。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亲代抚育、隔代抚育和代际合作育儿三种不同的抚育模式。代际合作育儿模式是儿童抚育成为农民家庭核心任务背景下的家庭策略调适。亲代独立育儿能力不足和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被压缩是代际合作育儿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的扩张以及祖代对孙代无条件的爱构成了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伦理基础。为了实现抚育效果的最大化,代际合作育儿家庭通常采取“教养分离”的育儿策略,并围绕育儿任务形成了新的家庭分工形态。代际合作育儿模式释放了年轻母亲的育儿压力,缓解了女性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但增加了年老父代的代际责任和压力。基于此,国家有必要构建更为完善的育儿社会支持系统,以减轻家庭的育儿压力,释放家庭的发展潜力,促进农民家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代际合作育儿;育儿模式;育儿环境;家庭分工;家庭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5)03-0171-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梳理

抚育是家庭的重要功能。^[1](PP.116~117) 家庭内部如何安排育儿分工,受到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家庭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传统乡土社会,父母是儿童抚育的主要责任主体,祖辈通常只是在父辈比较忙时临时帮忙照料孙辈。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和农民家庭的转型,育儿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家庭育儿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在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家庭内部如何安排育儿任务不仅是家庭大事,而且是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因此亟须对

之展开深入研究。关于家庭育儿模式的既有研究聚焦家庭育儿的性别分工、家庭育儿的代际分工与权力关系以及家庭育儿困境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三个方面。

其一,家庭育儿的性别分工研究。研究者认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之下,母亲基于对孩子生理性抚育的需要承担主要育儿责任。^[2](PP.122~144) 当前,城乡家庭儿童照料均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特征,甚至年轻母亲“丧偶式育儿”^[3]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父亲的角色从传统的“严父”转变为孩子的“玩伴”,通过游戏互动建立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4] 女性承担着主要的育儿责任,这引起了学界对“母职形象”的讨论,研究者发现母职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编号:21CSH030)。

[收稿日期]2025-02-18

[作者简介]李永萍,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出“经纪人化”^[5]和“超级妈妈”^[6]等形象。现代社会,作为母亲的女性既要承担对子女的生理性抚育职责,还是子女社会性抚育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女性在家庭育儿中的角色由“慈母”转变为“严母”。^[7]为了维持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平衡,部分女性通过“代际转包”或“市场转包”的方式减轻自身的育儿压力,但她们在育儿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主导性作用。^[8]父职缺位使得已婚女性普遍面临着“母职惩罚”^[9],并带来了“母职密集化”和母职焦虑等问题^[10],长期的“丧偶式育儿”模式加重了母亲的身心压力^[11]。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应当营造开放、多元的价值空间,使女性在流动的个体选择中获得积极的身份认同和自主人生。^[12]

其二,家庭育儿的代际分工与权力关系研究。随着家庭育儿愈益精细化和高标准化,代际合作育儿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13]代际合作育儿是指祖辈和父辈共同参与到儿童抚育的过程中,是代际团结和代际凝聚力的重要体现。^[14]代际合作育儿家庭的育儿分工呈现出“严母慈祖”^[8]的特征,母亲是“育儿总管”,统筹安排和规划儿童抚育的各项事务;而祖辈扮演着“帮助者”或“保姆”的角色。^{[15](PP. 312~318)}在代际合作育儿的过程中,权力关系呈现出“台前幕后”^[16]的特征,父辈(尤其是母亲)在育儿过程中具有绝对主导权,而祖辈则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17]。当两代人在育儿方面出现冲突时,年轻父辈的“科学育儿观”通常会战胜祖辈的“经验育儿观”。^[18]研究者认为,代际合作育儿中“父辈主导、祖辈边缘”的权力格局以亲密关系为前提,年轻母亲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祖辈主动让渡的结果。^[19]有研究指出,增强父辈与祖辈之间关于育儿知识的交流,有利于推动代际合作育儿的良性互动,减少父辈与祖辈的育儿冲突。^[20]

其三,家庭育儿困境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研究。当前,城乡家庭的育儿困境体现在经济压力大、时间精力不足以及缺乏有效的育儿知识指导等多方面。有学者总结出当前家庭抚育困境的典型特征:低母乳喂养率、低父亲参与率、高劳动强度和高隔代抚养。^[21]育儿困境不仅使得作为育儿主体的母亲容易陷入焦虑状态^[22],而且对家庭关系和家庭幸福感产生了负面影响。照料由家庭的私人问题走向社会化已不可避免。^[23]基于此,学者们提出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和社会支持系统^[24],从促进性别平等、构建制度保障以及建设更加健康公平的宏观社会环境等方面完善家庭抚育的社会支持

体系,形成家庭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婴幼儿照护格局^[25],以缓解家庭的育儿压力。

既有研究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中家庭育儿模式的复杂性具有重要启发,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挖掘的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家庭的育儿模式,较少关注农村家庭的育儿模式,尤其是较少对农村家庭中已经普遍存在的代际合作育儿模式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既有的关于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合作育儿中的代际角色分工与权力关系,缺乏对代际合作育儿模式更为系统性的研究。例如,农民家庭为何要采取代际合作育儿模式?农村为何能够形成有效的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代际合作育儿对家庭有哪些影响?上述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探讨。近几年,笔者在湖北省、江西省、广东省、安徽省、四川省等地的农村调研时都在关注农民家庭的育儿模式,发现代际合作育儿模式在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代际合作育儿不仅是农民家庭应对外在压力的策略性调适,而且深刻影响着农民家庭再生产和家庭的发展。基于此,本文聚焦农村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现象^①,探讨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形成机制以及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下家庭策略的能动性调适,这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现代社会家庭育儿模式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国家构建更为完善的家庭照料体系提供参考。

二、农民家庭育儿模式的变迁

育儿模式是指家庭内部如何安排育儿分工,即由谁来承担主要的育儿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育儿主体的不同,我国农民家庭育儿模式分为亲代抚育、隔代抚育和代际合作育儿三种模式。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农民家庭主要采取“亲代抚育”的模式,年轻父母是主要的育儿主体^②。其中,母亲主要承担生理性抚育职责,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父亲在孩子的日常照料中参与较少,主要承担社会性抚育职责,在孩子的个人品性和社会技能的习得等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这一阶段,祖代

① 本文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中的孙代年龄大约为0~15岁,即孙代处于初中毕业之前,这一阶段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最普遍。

② 虽然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建立公共托育结构承担了一部分儿童抚育的任务,但育儿责任在总体上仍然由家庭承担。

很少直接参与孙辈抚育,通常只在年轻父母比较繁忙时临时帮忙照料孙辈。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农民家庭育儿主体以亲代为主,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其一,家庭成员全部在村且以村庄为生活中心。这一时期打工经济尚未兴起,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都以村庄为中心,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年幼子女。其二,家庭权力结构以父代为中心。这一时期家庭权力仍然由年老父母主导,这奠定了父代在家庭中较高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父代主导的家庭权力结构限制了其人生任务的无限扩张,父代通常在子代结婚之后就退出主要的家庭生产领域,家庭生产性事务以及儿童抚育等事务主要由已婚的年轻子代承担,年老父母不承担抚育孙辈的刚性责任。其三,多子家庭结构进一步压缩了祖代参与儿童抚育的空间。这一时期农村家庭以多子家庭为主,且每个子代家庭生育的子女也不止一个,孙辈的数量较多,这使得祖代往往无暇顾及对孙子女的全方位照料。由此,亲代抚育成为这一时期大部分农民家庭主要的育儿模式。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农民家庭主要采取“隔代抚育”的模式,祖代成为主要的育儿主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逐渐增多,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愈益普遍,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26],家庭中的年轻子代夫妻大多到大城市务工,中老年父代夫妻则大多在村务农。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在外务工的年轻夫妻通常只在过春节时返乡,抚育儿童的任务主要交由祖代负责。这一阶段农民家庭之所以倾向于选择隔代抚育的育儿模式,主要是基于家庭资源禀赋的限制和积累家庭资源的需要。大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水平有限,难以将子女带到务工地点学习和生活。同时,经济积累是此阶段农民家庭的核心目标,因此农民家庭分工以最大化地积累资源为基本原则,育儿等家庭事务的安排都要服从于这一原则。在农业剩余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家庭资源的积累主要依靠务工,因此农民家庭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数量。隔代抚育模式可以将年轻夫妻从育儿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农民家庭有两个完全的劳动力参与市场,提升积累家庭资源的能力。可见,隔代抚育模式是资源积累目标下农民家庭的理性选择,既减少了年轻夫妻在育儿上的时间投入,使其有更多的精力务工以积累家庭资源,又减少了农民家庭育儿的经济成本,祖代在村抚育孙辈

相对于年轻夫妻在城市育儿的成本较低。

第三阶段:21世纪初期(大约2010年左右)以来。这一时期农民家庭主要采取“代际合作育儿”的模式,亲代和祖代共同参与儿童的抚育过程。随着隔代抚育模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育儿在家庭再生产中重要性的提升,农民家庭内部的分工原则由以资源积累为核心转变为兼顾育儿和积累资源的双重目标。在此情况下,无论是祖代还是亲代都难以独立完成育儿任务,农民家庭不得不调整育儿模式,代际合作育儿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选择。代际合作育儿要求祖代与亲代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从农民家庭再生产实践看,代际合作育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年轻媳妇从务工地点回到家乡与公公婆婆共同合作育儿,其中,一部分年轻媳妇回家乡后会在家全职育儿,还有一部分年轻媳妇会在家乡的县城就近务工并兼顾育儿;另一种类型是,年轻夫妻已经在城市买房定居,但由于夫妻双方都要工作,因此需要祖代阶段性地进城帮忙照顾孙辈。

可见,虽然中国家庭一直以来都以家庭抚育为主,但家庭内部的育儿分工以及育儿主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家庭所面临的具体生活情境和家庭目标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农民家庭根据其育儿需求的变化重新调整家庭分工,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在育儿方面形成有效的分工与合作,这是中国家庭“家庭主义”特征延续的深刻体现。在此意义上,代际合作育儿模式是管窥中国家庭转型之独特性的重要窗口。

三、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形成机制

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形成既根植于中国家庭本位的抚育模式,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际合作育儿模式隐含的基本前提是,现代社会亲代和祖代都无法独立完成育儿任务,家庭育儿必须依赖两代人共同参与和分工协作。那么,为何当前农民家庭的亲代和祖代都难以独立完成育儿责任?祖代又为何愿意加入到孙代抚育的过程中?下文主要从亲代独立育儿能力不足、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被压缩和代际合作育儿有一定的家庭伦理基础等三个层面分析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形成机制。

(一)亲代独立育儿能力的不足

在传统乡土社会,“父母是抚育孩子的中心人物”^{[1](P.116)}。父亲与母亲在儿童抚育中的责任和时

间投入并不均衡,母亲通常负责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在儿童抚育中投入的时间较多;而父亲则主要是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予教导,在儿童抚育中投入的时间较少。父母在儿童抚育上的性别分工主要源于儿童对母亲哺乳等生理性抚育的长期依赖。^{[2](PP. 122~124)}这进一步塑造了传统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夫妻双方分工协作使得亲代抚育得以有效运行。然而,现代社会发生的两个变化弱化了亲代的独立育儿能力。一是育儿越来越专业化和高标准化;二是作为儿童照料主体的母亲不再完全以家庭为生活中心,而是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儿童抚育需要家庭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而母亲在儿童抚育中可投入的时间却越来越少,由此导致亲代独立育儿能力的不足。本节主要从家庭育儿中的“父职参与不足”和年轻女性面临着“家庭—工作”平衡的困境两个维度分析为何现代社会的年轻父母无法独立完成育儿任务。

1. 家庭育儿中的“父职参与不足” 在激化的教育竞争催生了“拼妈”和母职崛起的同时,教育“拼爸”在当下社会也越来越普遍。城市中产和精英阶层的年轻父亲为了巩固自身的阶层地位,逐渐广泛地参与到子女教育的过程中,成为全职父亲或专职“奶爸”,以实际行动协助女性抚育和教育子女^[27],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年轻父母的育儿能力。然而,对于大部分农村普通家庭而言,囿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父亲长年在外务工,承担了家庭主要的经济资源积累责任,这使得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相对较少。结合笔者的田野调研,当前普通农村家庭的年轻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较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比较,父亲相对于母亲而言承担了较少的育儿事务;二是纵向比较,当前的年轻父亲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父亲而言,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少。上文述及传统农业社会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由于当时农村社会比较封闭,父亲长年生活在村庄,虽然他们平常较少承担具体的育儿任务,但是在子女成长过程的关键环节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农村社会,父亲往往长年不在家,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较少,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发挥的管教作用有限。对于很多年轻父亲而言,平常与子女相处时间较少,好不容易有时间与子女在一起就会对子女百般宠爱,因此,传统的“严父”已经非常少见,如今的年轻父亲大都扮演着“慈父”的角色。传

统农村家庭“严父慈母”的教养模式逐渐转变为“严母慈父”的教养模式。在“严母慈父”的教养模式下,育儿事务主要由母亲承担,父亲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孩子的玩伴。在子女教育需要家庭深度参与的当下社会,由父职参与的不足所形塑的“严母慈父”的育儿分工显然进一步增加了母亲的育儿压力,导致亲代独立育儿的空間被压缩。

案例 1: 山西省夏县 L 村的 CMY 有两个小孩,当笔者问及夫妻俩平常在教育孩子方面如何分工时,CMX 说,“孩子教育方面都是我管的多,老公平常一般不管。我平常管孩子多,但是两个孩子都喜欢爸爸,在家里也是我对孩子发脾气多,老公都是看我脸色行事”。CMX 说他们夫妻俩在孩子教育方面是典型的“严母慈父”。同时,她还观察到身边的朋友在孩子教育方面几乎都是“严母慈父”,她说,“现在的父亲对孩子都特别温柔,说话都温声细语的。家里管娃的基本都是妈妈,爸爸要么是忙,要么是惯,爸爸主要是陪娃玩一玩,只要娃开心就行,不管其他的,妈妈就不一样,什么都要管,有时就生气,容易发脾气”。(CMY, 女, 34 岁, 20240723)^①

2. 女性面临着“工作—家庭”平衡的困境 亲代独立育儿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育儿时间上的高投入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矛盾,即“工作—家庭”平衡的困境。在现代社会,有部分女性选择做“全职妈妈”以全身心地投入育儿过程,从而消除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全职妈妈”需要家庭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实际上,“全职妈妈”在已婚女性中的占比较低,并且主要集中于城市中产家庭。对于大部分已婚女性而言,她们仍然要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女性主体的角度看,她们具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当前,乡村社会中的年轻女性以“80 后”和“90 后”为主,她们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大部分年轻女性不愿意完全退回家庭做全职主妇,而是希望通过适度务工来实现自我价值。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务工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且意味着可以获得独立的生活空间并扩展其社交圈,这是其保持适度的主体性和实现自身价

① 括号内的信息依次为:受访者的姓名(首字母缩写)、性别、年龄及访谈日期。

值的重要途径。调研中有一位年轻女性提及:“无论工资高低,(女性)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有工作才有底气,才能有自己的选择。”(WPP,女,38岁,20240711)虽然大部分农村女性最终不得不回归家庭,但是,在务工的过程中,她们可以阶段性地接触和体验城市的生活方式,这构成其生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其次,从家庭经济角度看,年轻女性具有参与劳动力市场务工的必要性。当前,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来自务农和务工两部分,务农收入主要是维持在村家庭成员的基本口粮,家庭的现金收入主要依靠务工。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素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家庭内有多少劳动力参与市场务工。家庭参与市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民家庭的收入就越高;反之,农民家庭的收入就越低,并且还有可能会滑入贫困状态。^[28]一方面,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数量的多少与家庭的生命周期有关,当家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时,中青年夫妻因为要照顾家庭而被限制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当家庭处于三代劳动力都能进入市场时,家庭收入就比较高;另一方面,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数量的多少与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模式有关,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越好,配置效率就越高,家庭的务工收入就越多,反之则越低。可见,当家庭劳动力的数量构成影响家庭收入的主导因素时,家庭中的每一个劳动力都是有价值的,因而年轻女性作为家庭中的优质劳动力具有进入市场务工的必要性。当前,农民家庭的消费水平普遍较高,子女教育、建房买房、购买耐用消费品、人情往来等都需要家庭提供充裕的经济支撑。因此,农民家庭要优化劳动力的配置模式,使更多的劳动力深度参与市场,从而提升家庭资源积累的能力,保证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有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的提高并没有减少其育儿责任,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仍然要负担更多的育儿责任。^[29]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已婚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在市场化抚育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只能依靠家庭内部的重新分工来协调育儿难题,将年轻女性从育儿负担中适当地解放出来,以在家庭资源积累与儿童抚育之间达到适度平衡,因此,代际合作育儿成为很多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

(二)祖代独立育儿空间的压缩

隔代抚育是我国农村地区在打工经济兴起之

后出现的一种重要的育儿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普遍。虽然隔代抚育经常被诟病存在各种问题,如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30]、加重祖代的负担^[31]等,但是其确实将中青年父母从育儿负担中解放出来,强化了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那么,为何隔代抚育模式在当前不再受到农民家庭的青睐?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何以被压缩?

1. 育儿环境的变化 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被压缩首先源自育儿环境的变化。儿童抚育并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而是需要由家庭、学校、社会等主体构成育儿环境与育儿系统的整体支撑,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构成了儿童成长的重要制度系统。在此意义上,儿童抚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家庭教养主体和教养方式,而且与学校、社会等育儿环境息息相关。当学校、社会等育儿环境有利于儿童成长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尤其是隔代抚育的不足);反之,当学校、社会等育儿环境在儿童抚育中的作用日益式微时,则会加重家庭抚育的负担,强化隔代抚育的弊端。具体来看,育儿环境的变化主要从三个层面压缩了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

其一,学校向家庭转移了过多的教育责任和压力,导致祖代育儿能力的不足。在当前的家校关系下,家庭需要在子女的具体学业辅导方面承担责任。例如,当前很多小学生(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课后作业的完成往往需要家长的辅导和监管,这不仅意味着家庭需要在子女教育中投入更多的时间,而且提高了对家庭育儿主体文化素质的要求。农村祖代的知识水平大多不高,在孙代的学业辅导方面难以发挥出有效的作用,这导致了祖代在家庭育儿中愈益边缘化。

其二,互联网时代,社会环境的复杂化导致祖代对孙代监管能力的不足。相对于传统乡土社会,互联网时代儿童成长的社会风险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家庭需要对儿童成长进行更加细致的监管和引导。根据调研,当前乡村社会中儿童沉溺于手机和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中,隔代抚育的儿童表现尤甚。农村家庭中的祖代对手机和网络普遍不熟悉,难以及时地发现并扭转孙代手机游戏或网络成瘾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互联网时代儿童成长的社会风险,很多家庭不得不由年轻父母亲自承担育儿责任。

案例2:安徽省东至县Y镇的80后陪读妈妈WHQ说道:“现在小孩都没有自控能

力,连成人都控制不了要玩手机,何况是小孩?老人在这方面都管不了。(陪读)主要是预防小孩学坏,现在社会上的诱惑太大了,小孩学坏太容易了。县城里吃喝玩乐很多。(妈妈)陪读的,至少可以保证小孩不去外面鬼混。尤其是女孩子,更要好好管。”(WHQ,女,39岁,20210722)

其三,村庄熟人社会从家庭育儿中退场,凸显了隔代抚育的弊端。村庄熟人社会构成了农村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熟人社会中家庭成员以外的主体的在场和参与有助于弥补隔代抚育的不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的不断外流,乡村日益空心化和去公共化,农民越来越不愿意介入其他家庭的育儿事务。在田野调研中,有不少被访者提及,“现在谁还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你去说了,人家父母心里不一定高兴”。(ZJM,女,50多岁,20230721)育儿逐渐成为家庭的私事,由此进一步强化了育儿对家庭的依赖,隔代抚育问题日益突显。

2. 育儿观念和育儿期待的变化 家庭育儿观念和育儿期待的变化进一步压缩了祖代独立抚育孙辈的空间。农民家庭的育儿观念和育儿期待的变化主要开始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父母一代,与其父辈相比,“80后”和“90后”父母在育儿上普遍更加精细化和高标准化,育儿期待也明显提高,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实现家庭发展和阶层流动。在此情况下,年轻父母普遍不愿意将子女完全交给祖代抚育,认为完全的隔代抚育不仅容易因祖代的溺爱而造成孙代娇惯的性格,而且可能会因祖代对孙代学业辅导能力的不足而造成孙代学习成绩的落后。“80后”和“90后”父母之所以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相比于其父辈而言,“80后”和“90后”一代面临着更为充沛的劳动力市场,他们通过务工进行资源积累的空间更大。此外,“80后”和“90后”普遍只有一两个小孩,少子化的家庭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其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资源投入能力。二是与父母自身的成长经历相关。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多子女家庭结构以及父母教育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80后”和“90后”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并很早进入市场务工,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读书少给自己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希望子女不再重复自己的人生轨迹,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变

子女的命运。三是“80后”和“90后”一代面临着激烈的教育竞争。近年来,教育竞争已经从城市弥漫到乡村社会,教育城镇化、陪读、课外培训班等在乡村社会愈益普遍,农村年轻父母日益被卷入激烈的教育竞争,只有增加子女教育投入,才能缓解其教育焦虑。总体来看,年轻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期待的变化使子女教育成为农村家庭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家庭资源和家庭劳动力的配置都以子女教育为中心,由此,“80后”和“90后”一代年轻父母在主观上愿意亲自育儿,并在育儿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案例3:湖北省L县Y镇的LW,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初中毕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上小学6年级,小儿子不到1岁,他的妻子之前在做销售,现在全职带小孩。原本笔者访问的是LW的妻子,但恰逢LW刚好出车回来,一听到笔者问为什么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便不由自主地把话抢了过去,情绪激动地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后悔啊,我打小就很聪明,但我们读书时坏学生多。后来,我跟坏孩子玩到一起,(成绩)就不行了,如果我能够有跟我儿子一样的环境,我这样的天赋,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上了初中后,跟坏学生在一起打架,父母也不管我。后来,我爸中风瘫痪了,家里一落千丈,我就更不好好读书了,现在就很后悔”。(LW,男,38岁,20240712)正是基于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这夫妻俩决定不再外出务工,而是在家乡工作,从而可以兼顾孩子的教育。

在现代社会,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被压缩并非由于祖代主观上不愿意承担育儿责任,而是由育儿环境和育儿观念的变化塑造的。祖代独立育儿的空间被压缩意味着隔代抚育在农村家庭难以持续,农民家庭必须围绕育儿任务形成新的家庭分工模式。

(三)代际合作育儿的家庭伦理基础

代际合作育儿模式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是,祖代愿意参与到孙辈抚育的过程中。父母是儿童抚育的首要责任主体,“以父母来抚育孩子是一种生育制度的形式”^{[1](P.116)},而祖代并不承担抚育孙辈的刚性责任,那么,为何祖代仍然愿意参与到孙辈抚育过程中?这就要回到中国家庭文化和家庭伦理来进行理解和分析。

首先,祖代参与孙辈抚育是基于“帮子女”,即

对年轻子代家庭的支持。在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父代对子代具有较为厚重的代际责任,有学者将之总结为“恩往下流”^[32]。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压力下,中国“家庭主义”的传统被进一步激活和强化^[33],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绵延。带孙子在大部分乡村社会中由“非刚性的人生任务”逐渐演变为祖代必须完成的“刚性人生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祖代参与孙辈抚育看似具有一定的“代际剥削”性质,但大部分祖代表现出“心甘情愿”的态度。具体来看,当前农村家庭的年老父母之所以愿意帮助子代带小孩,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庭整体发展的需要。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已经逐步从简单家庭再生产跨越到复杂家庭再生产阶段,农民家庭的目标由维持型目标逐步转变为发展型目标,实现家庭城市化和家庭阶层流动成为大部分农民家庭奋斗的终极目标,这就提高了对农民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要求。家庭发展以年轻子代家庭为核心,但由于仅仅依靠年轻夫妻二人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上述家庭目标,因此农民家庭必须对家庭劳动力进行合理分工,以尽可能地从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资源。在此情况下,中老年父母被重新整合进子代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形成了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新三代家庭”^[34]。二是期待建立代际之间的亲密情感。对于中老年父母而言,他们参与孙辈抚育不仅是代际责任的延续,而且有助于增进代际之间的亲密关系。代际合作育儿意味着两代人相处的时间增多,虽然两代人在合作育儿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但合作育儿过程为两代人提供了更多的日常互动与交往空间,这是代际亲密关系建立的基础。三是强化子代未来的养老反馈。当前,农村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父母基本上都积攒了一些养老资源,对子代在养老上的物质反馈并没有太强的需求,但对子代的情感反馈却非常期待。调研中,有很多的中老年父母提及,只要自己当下为子代付出得更多,未来子代在履行赡养义务时就会更加尽责。

其次,祖代参与孙辈抚育是基于“亲孙子”,即对年幼孙辈的纯粹的“爱”。在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隔代亲”是一个普遍现象,祖代对孙代通常都比较疼爱,他们会尽可能地满足孙代提出的要求。从纵向的代际关系看,相邻的两代人(即父代与子代)之间具有较强的权责关联,而隔代(即祖代与孙代)之间并不具有刚性的权责关联。然而,隔代之间基于血缘连带仍然具有很强的价值关联和情感

关联,“隔代亲”使得祖代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孙代则可以享受祖代的疼爱。祖代之所以能对孙代付出无条件的疼爱,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价值绵延。作为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代,孙代代表着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因此,祖代在孙代身上有着强烈的价值寄托,孙代是祖代获得完满人生价值体验的重要载体。二是情感满足。由于祖代与孙代之间并没有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可以更加充分地表达情感,并从对方那里获得及时的情感反馈。对于祖代而言,孙代对祖代的情感反馈主要体现为日常生活中对祖代的无限依恋,这使得祖代在孙辈抚育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情感满足。三是作为祖代讨好子代的一种策略和方式。在子代主导家庭权力结构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的背景下,爱孙子成为祖代讨好子代的一种方式,祖代希望通过孙辈的疼爱来换取儿子和儿媳妇的好感,并建构两代人之间更加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

案例 4:安徽省东至县 Y 村一位男性老人说:“爷爷奶奶对孙子女,只有爱,没有要求。看到孙子就感觉看到自己孩子小时候一样,是一种爱的延续。”当笔者问及爷爷奶奶是否会打骂孙子女时,这位男性老人说,“爷爷奶奶不好打、不好骂,我自己的小孩以前都打过骂过,但是孙子孙女我从来没有打骂过。小孩父母本身就不在身边,本身就挺可怜的,爷爷奶奶也舍不得打。万一小孩打电话给自己爸妈,说爷爷奶奶打了他,爷爷奶奶也怕儿子、媳妇不高兴”。(FRJ,男,70岁,20210712)

可见,代际合作育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较强的伦理支撑,父代对子代代际责任的延续以及祖代对孙代爱的表达共同奠定了代际合作育儿的伦理基础。

四、农村家庭的育儿方式与分工策略

代际合作育儿模式是在儿童抚育成为家庭核心任务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对于抚育实践的能动性反思与调适。随着育儿环境的变化以及育儿期待的提高,儿童抚育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推动农民家庭围绕育儿任务形成新的分工形态,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由此产生。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策略,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的有效运行要求代际之间在育儿上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这激发了“教养分离”的育儿策略,以实现抚育效果的最大

化。同时,支撑“教养分离”育儿策略有效运行的是农民家庭更深层次的分工策略。基于此,下文主要从育儿策略和家庭分工策略两个层面分析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下家庭策略的调适。

(一)育儿方式:教养分离

儿童抚育是一项全面系统的任务,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照料、智识培养和品性培养三个方面。日常生活照料属于“养”的范畴,即生理性抚育;智识培养和品性培养属于“教”的范畴,即社会性抚育。社会性抚育不仅需要抚育主体的言传身教,而且需要详细规划与统筹安排,对抚育主体的能力与素质有较高要求。代际合作育儿家庭通常是由年轻母亲与祖代双方或一方(通常是奶奶)共同抚育小孩,为了更好地完成儿童抚育任务,大部分代际合作育儿家庭都采取“教养分离”式的育儿策略,即年轻母亲负责“教”、祖代负责“养”。“教养分离”的育儿策略既符合两代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又能充分发挥两代人的优势和能力,是一种有效的代际育儿分工方式。

“教养分离”的育儿策略根本上源自精细化和科学化育儿观的兴起,既要求家庭在育儿上统筹规划,又要求家庭进行更为精细化的育儿分工。具体而言,祖代在育儿中主要发挥着“养”的作用,负责照料孙代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包括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接送小孩上下学以及对孙代的日常陪伴等;年轻母亲在育儿中主要发挥着“教”的作用,聚焦子女的学业、行为习惯以及性格培养等方面内容,如孩子上什么学校、选择哪些培训班等主要由母亲来全权规划和具体安排。大部分年轻母亲有自己的工作,但她们在工作之余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儿童抚育上了。一方面,她们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孩子的学业辅导方面花费较多精力;另一方面,她们非常注重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花费很多时间了解和陪伴孩子,并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教育和影响孩子。“教养分离”明确了代际合作育儿中的边界与分工,尤其是明确了祖代在育儿中的主要责任,从而避免了祖代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过度介入。

“教养分离”并非一种制度化的育儿分工模式,而是两代人在共同育儿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一套适应性策略。“教养分离”的育儿分工并不意味着祖代和亲代在儿童抚育过程中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实际上,“教养分离”蕴含着儿童抚育过程中代际权力不均衡的格局。在“教养分离”式代际合作育儿

的过程中,年轻母亲是育儿的主导者,在育儿事务上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祖代主要是以帮助者的角色进入子代家庭,在育儿上缺乏话语权,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年轻母亲在育儿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育儿事务和育儿过程由母亲全权规划和统筹安排。无论是“教”还是“养”,都由母亲统一规划,大到孩子的学业规划,小到孩子日常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都由母亲统筹安排。虽然祖代负责孩子的“养”,但具体如何养则是由母亲安排的,祖代只是按照年轻母亲的意见去具体操持。另一方面,年轻母亲会对祖代不妥当的育儿行为进行及时干预和制止。也就是说,祖代的育儿行为处于年轻母亲的监管和监控之下,如果年轻母亲发现祖代育儿行为有不妥当的地方,就会直接干预。总体来看,年轻母亲在育儿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祖代的默许和认可。

(二)农村家庭的分工策略

农民家庭分工形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围绕着家庭目标定位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在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下,家庭分工以育儿任务为核心,同时兼顾家庭资源的积累。这要求家庭分工超越简单的代际分工或夫妻分工,以三代家庭为整体形成更加精细、复杂的分工形态。具体而言,农民主要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家庭分工策略。

第一种家庭分工策略是,年轻媳妇从打工地回到家乡,与公公婆婆一起完成育儿任务,形成“一家三制”^[35]的家庭形态。家庭成员的具体角色分工为:儿媳妇和婆婆合作育儿,年轻男性在大城市务工,年老男性承担主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及在农闲时节打零工。每位家庭成员都依据其自身的家庭角色在家庭再生产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年轻男性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支柱,承担家庭资源积累的主要责任;年轻女性是育儿的主要责任主体;年老女性则既要协助儿媳妇抚育孙辈,又要完成家庭主要的生活性事务;年老男性通过务农和打零工实现了夫妻俩养老“自养”,并且能够在经济上资助子代家庭。可见,这一家庭分工形态突破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年轻女性家庭角色的转变,即原本以外务工为主的年轻女性回到家乡以照料小孩为主,当然,部分年轻女性会在育儿的同时尽可能地在家乡附近寻找务工机会。年轻女性家庭角色的变化意味着其他家庭成员需要对其自身的家庭角色做出相应调整,以弥补年轻女性不能完全参与市场务工

所导致的家庭收入的减少,如家庭中的年轻男性通常会选择多加班或者是选择高危行业,以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

第二种家庭分工策略是,祖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子代家庭协助子代完成育儿任务。当前,农村部分年轻人已经在城市买房定居,由于年轻夫妻双方都要工作,因此需要祖代协助育儿。为了减少在城市的生活开支以及兼顾家庭的农业收入,大部分家庭选择由年老女性进城帮助照料孙辈,年老男性则留守农村。家庭成员的具体角色分工为:年轻男性从事全职工作;年轻女性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并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上;年老女性协助抚育孙辈和料理子代家庭的生活性事务;年老男性则在村务农。在此家庭分工模式下,年轻男性肩负着家庭资源积累的重担;年轻女性则要兼顾育儿与自身职业的发展;年老女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孙辈抚育和子代家庭生活性事务之中;年老男性则务农自养,并为在城市生活的子代家庭提供必要的农产品。可见,在这一家庭分工形态中,祖代的家庭角色分工转变得最为明显,祖代夫妻从夫妻双方共同在村务农调整为一方阶段性地进城抚育孙辈、另一方留守农村成为“独居老人”。因此,祖代夫妻双方都需要重新调适自身的家庭角色,以适应家庭再生产的要求,其中,进入城市的年老女性要融入子代的家庭生活并学会处理与子代之间的日常关系,而留守的年老男性则要逐渐适应独居生活。

上述两种家庭分工策略都具有阶段性特征,是农民家庭在育儿关键期采取的主要家庭分工形态。当农民家庭完成主要的育儿任务后,家庭分工模式会随之调整,返乡的年轻母亲可能会再次回到大城市务工,而进城抚育孙辈的祖代则回到家乡养老。这说明,在城乡中国背景下,农民家庭分工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和灵活性,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的核心目标不同,农民家庭会对家庭分工进行灵活配置,以顺利完成家庭在每一阶段的任务。农民家庭分工的策略性和灵活性根植于中国家庭厚重的伦理底蕴,是家庭主义延续的重要体现。

代际合作育儿模式不仅构成了反思中国家庭性质的重要经验支撑,而且是进一步反思母职问题的切口。代际合作育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年轻母亲的育儿压力,缓解了女性的家庭角色与职业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必须看到,农民家庭代际合作

育儿模式在缓解年轻女性的育儿负担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年老父代的代际责任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年老父母面临着代际责任的扩张,要在经济上和劳动力上继续支持子代家庭,进而压缩了其自养的空间;另一方面,年轻媳妇对育儿决策的主导使年老父母在代际合作育儿中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现代社会育儿的复杂性与高投入使得育儿任务已经超出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在此意义上,育儿已经由家庭溢出而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需要家庭、政府和社会等主体共同关注。因此,国家有必要构建更为完善的育儿支持系统,以减轻家庭的育儿压力,释放家庭的发展潜力,促进农民家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一卷)[M].袁树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3]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J].北京社会科学,2019,(10).
- [4]王向贤.关于欧美建构新型父职的评述[J].晋阳学刊,2014,(3).
- [5]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18,(2).
- [6]钟晓慧,郭巍青.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2).
- [7]李硕.代际抚育合作关系中女性家庭权利的嬗变——基于婚姻法中“家”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9,(6).
- [8]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
- [9]杨菊华.健全托幼服务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J].妇女研究论丛,2016,(2).
- [10]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
- [11]徐依婷.“丧偶式育儿”: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J].宁夏社会科学,2020,(6).
- [12]吴小英.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14,(2).
- [13]陈辉.老漂: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8,(2).
- [14]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6,(4).
- [15]沈奕斐.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 [16]王兆鑫.“台前幕后”:农村家庭儿童抚育过程中祖辈、父辈的职能分工和代际关系[J].社会建设,2020,(2).
- [17]汪永涛.转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J].社会学

- 评论,2020,(2).
- [18]张杨波.代际冲突与合作——幼儿家庭照料类型探析[J].学术论坛,2018,(5).
- [19]沈奕斐.“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 [20]李兴睿,冯剑侠.后喻文化语境下代际合作育儿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基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6).
- [21]陈雯.亲职抚育困境: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J].中国青年研究,2017,(10).
- [22]魏杰,桑志芹.新生代母亲的抚育困境与育儿焦虑——基于新媒体“中年老母”群体的社会心理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10).
- [23]吴小英.照料的问题化及其政策选择——一个家庭变迁视角的探讨[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 [24]张秀兰,徐月宾.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 [25]洪秀敏,朱文婷.全面两孩政策下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育儿压力、母职困境与社会支持的调查分析[J].教育学报,2020,(1).
- [26]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
- [27]唐咏.被建构的焦虑母职和参与父职:基于深圳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的质性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 [28]贺雪峰.论农民收入断裂带[J].学术研究,2019,(1).
- [29]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J].妇女研究论丛,2002,(1).
- [30]范先佐,郭清扬.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 [31]肖雅勤.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CHARLS的实证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7,(1).
- [32]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
- [33]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J].探索与争鸣,2021,(10).
- [34]李永萍.家庭能动主义:农村新三代家庭的结构韧性及动力机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
- [35]李永萍.“一家三制”:教育城镇化背景下的亲代陪读与农民家庭形态调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6).

(责任编辑 屈虹)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The Adap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hild-rearing Models in Transitional Peasant Families

LI Yong-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Parenting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family.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peasant families have formed three different child-rearing models: parent-child parenting, intergenerational child-rear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model is a family strategy adaption made in the context where child-rearing becomes the core task of the family. The lack independent child-rearing ability of the parent generation and the compression of the independent child-rearing space of the grandparent generation are the direct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father generation to the offspring and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the grandparent generation to the grandchildren constitute the family ethics basis for the 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families often adopt the child-rearing strategy of separation of upbringing and form a new family of labor pattern around the task of child-rear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 model not only releases the child-rearing pressure of young mothers but also mitig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role and the occupational of wome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ncrea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pressure of the older father generation. Based on thi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child-rearing social support system,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childcare on families, to releas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families,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ie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Childcare; Child-rearing Models; Child-rearing Environment; Division of Family Labor; Familyism